

# 中国现代史教学参考资料

教学用书·妥善保存

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 目 录

##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                                         |        |
|-----------------------------------------|--------|
|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1921年).....                 | ( 1 )  |
| 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一、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br>.....李 达( 3 ) |        |
| 马林赴华回忆.....                             | ( 16 ) |
|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栖梧老人( 26 )             |        |
| 访问刘亦宇谈话记录.....                          | ( 35 ) |
| 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廖焕星( 46 )                |        |
| 国民党底分析.....陈潭秋( 54 )                    |        |
| 周恩来同志报告大革命.....                         | ( 59 ) |
| 党的机会主义史.....蔡和森( 69 )                   |        |
| 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王若飞( 108 )            |        |
| 第一次大革命的回忆.....吴玉章( 131 )                |        |

##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                                       |         |
|---------------------------------------|---------|
| 中国革命与共产党(节录).....瞿秋白( 167 )           |         |
| 湘南暴动大纲(1927年8月).....                  | ( 172 ) |
| 关于湖南秋收暴动的经过(1927.10.8).....彭公达( 173 ) |         |
| 中共中央给毛泽东、朱德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的信<br>(二月来信)..... | ( 184 ) |

|                                 |            |
|---------------------------------|------------|
| 毛泽东同志代表前委给中央的信(节录1929.4.5)..... | ( 192 )    |
| 各苏区土地问题:.....                   | 李六如( 195 ) |
| 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            |            |
| ( 黎平会议决议, 1934年12月18日 ) .....   | ( 229 )    |
|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            |
| ( 猴场会议决议, 1935年1月1日 ) .....     | ( 231 )    |
| 中央政治局决定(1935年6月28日两河口决议).....   | ( 233 )    |
| 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 1935年8月20日       |            |
| 政治局通过 ) .....                   | ( 234 )    |
| 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俄界会议决议,           |            |
| 1935年9月12日 ) .....              | ( 237 )    |
| 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              | 毛泽东( 240 ) |
| 八月失败.....                       | 杜修经( 248 ) |
| 关于“二十八个半” .....                 | ( 255 )    |
| 关于西安事变.....                     | 王炳南( 259 ) |

\*

\*

\*

关于党史上若干问题的辅导解答( 1979.8.18 )

.....胡 华( 280 )

#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

(一九二一年)

一、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二、我们党的纲领如下：

(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

(2)直至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至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

(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和征用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工具；

(4)加入第三国际。

三、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黄色的知识分子及与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一切联系。

四、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民族都可以接受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是在加入我们的队伍以前，必须与那些与我们的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

五、接受新党员的手续如下：候补党员必须接受所在地的委员会的考察，考察期限至少为两个月。考察期满后，经大多数党员同意始得转为正式党员，如果该地还有执行委员会，必须经执行委员会批准。

六、在党处在秘密状态时，对于重要的暗号和党籍应保守秘密。

七、每个地方、凡是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必须成立委员会。

八、委员会的党员经以前所在地委员会书记介绍，可以转到另一个地方的委员会。

九、凡是党员不超过十人的地方委员会，应设书记一人；超过十人的应设财务委员、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各一人；超过三十人的，应由委员会的成员中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关于执行委员会的规定下面将要说到。

十、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等地方组织中的党员人数多时，可以派他们到其他地方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严格监督。

十一、遗漏——原译者注

十二、地方委员会的财政、活动和政策，必须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

十三、委员会所管辖的党员超过五百人或同一地区有五个委员会时，必须成立执行委员会；全国代表大会应委派十人参加该执行委员会，如果这些要求能实现，必须成立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和组织下面将更加详细的阐述。

十四、党员如果不是由法律的迫使和没有到党的特别允许，不能担任政府的委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在此例。

十五、这个纲领经三分之二全国代表大会同意，始得修改。

（此件为共产国际保存的俄文译稿）

# 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

李 达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及五四运动后，由于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提高，由于马列主义的介绍、研究与宣传的相当普遍，由于苏联十月革命的先导，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阶级基础，思想的准备与国际的声援等客观与主观的条件，都已经具备了。

一九二〇年四月，第三国际东方局，派了威琴斯基（他的夫人同行）来到了北京。据他说：“东方局曾接到海参威方面的电报，知道中国曾发生过几百万人的罢工、罢课、罢市的大革命运动，所以派他到中国来看看。”（他曾在美国做工多年，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

他到了北京以后，首先访问了以李大钊同志为首的许多进步人士，举行过几次座谈会，许多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参加了。因为苏俄政府第一次对中国的宣言（即废除帝俄政府与中国所订的不平等条约）刚才传到了中国，中国很多社会团体都表示热烈的欢迎，所以一听到苏联人来到了北京，大家对他感到特别高兴。威琴斯基在几次座谈会上，报告了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的实际情况及其对外的政策。当时李大钊同志等对于这位好朋友，很诚实的和他交换

意见，至于那些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带着好奇心，参加了一两次座谈，以后和他也疏远了，和他经常接触的还有张太雷（因为他懂英文）、杨明斋（华侨，因为他在俄国东方大学读过书，懂俄文）二人。

由于李大钊同志的介绍，威琴斯基到了上海，访问了“新青年”、“星期评论”、“共学社”等杂志、社团的许多负责人，如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及其他各方面在当时还算进步的人们，也举行过几次座谈。其经过也和北京的一样，最初参加座谈会的人还多，以后就只有在当时还相信马列主义的人和威琴斯基交谈了。由于多次的交谈，一些当时的马列主义者，更加明白了苏俄和苏共的情况，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

在这时候，“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事被列入了日程。威琴斯基来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联系，他不懂得什么理论，在中国看了看以后，说中国可以组织中国共产党，于是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戴季陶等人就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孙中山知道了这件事，就骂了戴季陶一顿，戴季陶就没有参加组织了。当时，一九二〇年八月，在上海参加发起的人有陈独秀、李汉俊（党成立大会以后退出）、陈望道（是党成立大会以后退出）、俞秀松、施存统（参加后去日本留学，现属民建）、沈玄庐（大地主，第二年退出）、李达等七人。当时还曾起草一个党章草案，由李汉俊用两张八行信纸写成，约有六、七条，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用下列的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一、劳工专政，二、生产合作。”我对于“生产合作”一项表示异议，陈独秀说：“等起草党纲时再改”。

这个组织发起后，由陈独秀、李汉俊找关系。当时在全国各地发起组织共产党的有：在北京由李大钊、张太雷、邓

中夏、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李梅羹等人，在武汉由陈潭秋、董必武、包惠僧等人（李汉俊本人也去到武汉）；在广东由谭平山、陈公博、陈达材等人；在济南由王烬美（山东第五中学学生）、邓恩铭等人；在东京由施存统、周佛海等人；在湖南由毛泽东同志负责；另函约巴黎的朋友在巴黎组织。邵力子、沈雁冰是在党发起以后加入的（以后都退出了）。截至一九二一年六月止，共有八个中国共产党小组，而巴黎小组与国内各小组当时联系很欠缺。

成立共产党的会议是在“新青年”杂志社内召开的。在会上大家提供的工人运动的材料很少，第三国际的宣言和决议案在这次的会议上也出现了。当时党的上海小组的工作分两部分：一是宣传工作，一是工运工作；宣传方面，决定把“新青年”作为公开宣传的机关刊物，从八卷一号开始；另行出版“共产党月刊”（报纸十六开本，约三十二面），作为秘密宣传刊物。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七日出了创刊号，这刊物的内容主要是刊登第三国际和苏俄的消息，各国工人运动的消息。至于工运方面，在上海杨树浦组织了一个机器工会，由李中主持，此外还在上海小沙渡路筹组纺织工会，但未组成。北京、武汉和长沙等地，也开展了工人运动。

党的上海发起组，推陈独秀做书记。另外还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因为当时有许多青年离开学校和家庭来到上海找“新青年”社想办法，所以上海共产党组织就把他们组织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S·Y·），上海的团部设在华龙路新渔阳里（铭德里）六号，两层两底的房子里，挂了“外国语学校”的招牌，团员有二十余人，由威琴斯基夫人教授俄文，团务由俞秀松主持。这S·Y·的组织，除上海，北京、武汉、长沙也组织了。



本年，孙中山在广州做大元帅。十一月邀约陈独秀去广做教育厅长，陈把书记的职务交由李汉俊担任，“新青年”也交他和陈望道主编，我负责编“共产党月刊”，这杂志的稿子主要由“新青年”社供给。十二日间，威琴斯基回苏俄去了。当时党的工作经费，每月仅需大洋二百元，大家却无力负担，因为当时在上海的党员大都没有职业，不能挣钱，搞工人运动没有钱不成。“新青年”社在法租界大马路开了一家“新青年书社”，生意很好，李汉俊向陈独秀写信提议由“新青年书社”按月支二百元做党的经费，陈独秀没有答应。还有陈独秀临去广州时，曾对李汉俊约定，“新青年”每编出一期，即付编辑费一百元，后来李汉俊未能按月编出，该社即不给编辑费，因此李汉俊认定陈独秀私有欲太重，大不满意。这是他两人之间的冲突的起源。这时候党的经费是由在上海的党员卖文章维持的，往后因为经费困难，“共产党月刊”出至第二期就中止了。

一九二一年二月，陈独秀起草了一个党章，寄到上海，李汉俊看到草案上主张党的组织采中央集权制，对陈独秀甚不满意，说他要党员拥护他个人独裁。因此他也起草了一个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中央只不过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陈独秀看了李汉俊的这个草案，大发雷霆，从广州来信责备我一顿，说上海的党员反对他，其实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件事。从此以后，陈独秀和李汉俊二人之间的裂痕愈来愈深。我觉得党刚才发起就闹起分裂来，太不象话，只得调停于二者之间，要大家加强团结。但李汉俊态度坚决，不肯接受调停，并连书记也不做了，“新青年”也停刊不编了，他就把党的名册和一些文件移交于我，要我担任书记。我为了党的团结，只好接受了。李汉俊原是无政府主义者，后来看了考茨基的

书才转变过来，他很想做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去宣传无产阶级的政见。他的本性原是一个热中利禄的人，所以在党的成立大会开过以后，就跑到国民党去了。

一九二一年六月中旬，马林（荷兰人）和尼可洛夫（俄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大会决定于七月一日开幕。据我的记忆，当时国内和东京七个小组，共有党员约四十余人，巴黎的小组不详。

六月下旬，到达上海开会的各地代表共十二人：

长沙——毛泽东，何叔衡。

武汉——董必武，陈潭秋。

上海——李达，李汉俊。

北京——刘仁静，张国焘。

济南——王烬美，邓恩铭。

广州——陈公博。

东京——周佛海。

李大钊同志和陈独秀均未参加。

到会的代表，除原住上海的人以外，都住在嵩山路（蒲柏路）一个三楼三底的博文女校里，因为当时正放暑假（现在该校已改为革命纪念馆）。

党的第一次会议是七月一日下午八时在上海贝勒路（望志路）树德里三号李汉俊的寓所举行的，代表十二人全体出席，第三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可洛夫也到了。会场的布置很简单，只有一个大餐桌，周围可坐十余人，各代表席上只放了几张油印的文件，也没有张贴什么标语。当时开会，大家没有一点经验，连怎么开法都不知道。会上有两个问题争论不

休，一个问题是，共产党人要不要加入资产阶级国会，另一个问题是南北政府有什么不同。关于第一个问题，李汉俊主张参加，刘仁静反对参加。关于第二个问题，有的说，北京政府不好，南方政府也不好，都是一丘之貉；有的说，我们的领袖（指陈独秀）还在广州做教育厅长，由此可见南方政府比北方政府进步些。代表们交换了一些意见之后，马林即席讲话，大意是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世界上有很重大的意义，第三国际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党添了一个东方的朋友。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了。他在演说中，强调着要致电第三国际，报告中共的成立。并希望中国共产党的同志努力革命工作，接受第三国际的指导。他讲话的时间约十多分钟，声音宏大，马路上的人都可听到。他致词后正在开始做报告之时，忽有一个不速之客闯进会场来，张目四看，我们问他“找谁？”他随便说了一个名字，匆忙的下楼去了。马林很机警（富有地下工作经验），他说“此人可疑，我们赶快转移。”我们离开会场不过一刻多钟，法租界巡捕房开了两辆卡车，载了十多个巡捕，拥进那个会场，结果扑了一个空，连片纸只字都没有得到。这房子的主人是李汉俊，能说法国话，他和那些巡捕说他家里并无人在开会，那些巡捕只好走了。这真危险，假设没有马林的机警，我们就会被一网打尽了。这是因为马林用英文大声演说，夹杂着说了好几次中国共产党，被法国巡捕听去了，所以才有那一场风波。

七月二日，代表们在住所里互相交换意见，报告各地工作的经验。当时党的工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与工人运动两项。北京小组在长辛店做了一些工人运动。武汉方面，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及其他各工厂的工人运动也是刚才开始。长沙小组，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成绩。看当时各地小组的情

形，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其他各地小组的组织却比较散慢些。当时成为争论的一个问题是议会政策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代表住所的一个房子里，经常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他苦心思索竟到这样的地步，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殊不知他是正在计划着回到长沙后如何推动工作，要想出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办法。毛泽东同志后来做全党领袖，在这时已显露了端倪。

为了开会的安全起见，我们在嘉兴布置了一个会场。这会场是在南湖中游湖的大画舫上，时间是七月六日上午十时到下午六时。当天上午七时，大家从上海北站乘车出发，十时许在大游艇上聚齐。马林和尼可洛夫因为是外国人，容易引人注目，未去参加。讨论的议题主要是党章和工作方向。在党的组织方面分中央与地方，中央设书记、宣传主任与组织主任，地方组织也分这三部分。宣传方法仍旧以“新青年”为公开宣传刊物，以“共产党月刊”为秘密宣传刊物。组织方面重在工运，以上海、武汉和京汉、陇海两铁路为中心。其次讨论发展党员的办法，并决定各地都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从团员中提拔进步分子入党。其次讨论过对于资产阶级议会的态度，有人主张应该利用这样的议会，宣传党的政见，有人反对参加这样的议会，以免陷于改良主义的偏向。当时因为这样的问题还没有到列入日程的时机，对此未作决定。接着大会讨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草案，这宣言有千把个字，前半大体引用“共产党宣言”的语句，我记得第一句是“一切至今存在过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接着说起中国工人阶级必须起来实行社会革命自求解放的理由，大意是说中国已有产业工人百余万，手工工人一

千余万，这一千多万的工人，能担负起社会革命的使命，工人阶级受着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双重剥削和压迫，已陷于水深火热的境地，只有自己起来革命，推翻旧的国家机关，建立劳工专政的国家，没收国内外资本家的资产，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才能得到幸福生活。宣言草稿中也分析了当时南北政府的本质，主张封建的北洋政府必须打倒，但对于孙中山的国民政府也表示不满。因此有人说“南北政府都是一丘之貉”。但多数意见则认为孙中山的政府比较北洋政府是进步的，因而把宣言中的语句修正通过了。宣言最后以“工人们失掉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一句话结束（这个宣言后来放在陈独秀的皮包中，没有下落）。大会最后讨论党的组织问题，通过了一个简单的党章（这个党章和那个宣言一样都没有印行），并决议成立一个中央工作部，设一个书记，一个宣传主任，一个组织主任，工作部地址设在上海，兼负责上海支部，各地支部各设书记一人。中央工作部的书记推陈独秀担任，宣传主任推李达担任，组织主任推张国焘担任，共组成了中央工作部。于是大会宣告闭幕。次日各地代表陆续离开了上海。沈玄庐、李汉俊、陈望道在第一次代表大会后退出了组织。陈公博也退出，去美国留学去了。

第一次代表大会开过以后，党的组织阵容相当整齐了。中央与各地立即行动起来，分别进行宣传与工运工作，逐步表现了成绩。我这里只说起中央工作部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以后至一九二二年七月的工作情形。

九月间，陈独秀辞去广东教育厅长，回到上海，专任党中央的书记，常与马林、尼可洛夫会商（陈独秀在法租界曾被捕过一次，由孙中山打电话给法领事释放），当时决定宣传工作，仍以“新青年”为公开刊物，由陈自己主持，我则

继续编辑“共产党月刊”，作为秘密宣传刊物（从第三期起至第七期止）。此外，本年秋季，在上海还成立了“人民出版社”（社址在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准备出版马克思全书十五种，列宁全书十四种，共产主义者（康民尼斯特）丛书十一种，其它九种。但在这一年内，只出版了十五种，如：《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苏维埃论》、《共产党星期六》、《哥达纲领批判》等书，还出版了几种临时宣传性的小册子。“人民出版社”由我主持，并兼编辑、校对和发行工作，社址实际在上海，因为是秘密出版的，所以把社址填写为“广州昌兴马路”。

十月间，陈独秀和我商议，在上海创办一个女校，以期养成妇运人才，开展妇运工作。我任该校校长。入校学生约二十人，丁玲、王一知、王剑虹等均由该校出身。当时任教者如陈独秀、高语罕、邵力子、陈望道、沈雁冰、沈泽民等，但办理不到一年，因经费支绌就停办了。

组织工作由张国焘主持，当时所谓组织工作，是专指工会的组织说的。他在北成都路设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找了十多个人，在办公桌上工作，一共搞了三个多月，却不曾组织一个工会。有一天，英租界巡捕房去了一个人询问那招牌是谁挂的。他听了这个消息，连夜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招牌烧毁，把一切工作人员都遣散了。他于是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迁到北京，交由邓中夏同志主持，他自己跑到莫斯科去了。在他离开上海起到第二届代表大会止的期间，上海几乎没有做工人运动。张国焘原是官僚地主家庭出身，带着旧官僚的作风，投机到党里来，他只知个人利益，不顾党的利益，他眼霎眉动，诡计多端，若与别人有利害冲突，就遇事倾轧。“打倒你，我起来”，这是他

唯一的率领。我早就看破他是“大不老矣”的人。

马林和鹿可洛夫几乎每星期要约集陈、张和我，三人会议一次，听取我们的工作报告。我的报告很简单，因为每一星期不能有书出版，否则我虽是宣传主任，而实际只是个作者和编辑。张国焘把每星期所接触的两三个工人的经过，用断续而拮据的英语，作冗长的报告。陈独秀的报告很少，因为这时的工运，在京汉与陇海两铁路方面，汉口段由武汉的党主持，北京段由北京的党主持，中央只派了一个人到郑州主持，所以上海方面没有好多可以报告的材料。还有陈独秀不住在自己寓所里，另外找了一个女人住小房间。除了他隔几日来与我们相会外，我们不知道他的住处。他究竟每天做了些什么，我们全不知道。据我所知，除了他隔三、五日来我寓所看文件，拿几封信回去（因为党的通信都由我收转）作答以外，似乎没有什么工作。所以向马林作汇报，在陈独秀是一件不愉快的工作。所以陈独秀汇报了一次，第二次他就不去了。后来他大发牛性，要对马林等闹独立。他说，不要国际帮助，我们也可以独立干革命，我们干我们的，何必一定要与国际发生关系。这样他一连几个星期不出来与马林等会面。我认为中国革命而不与国际相联系，太闹笑话了，所以曾和张国焘几次去劝他。他个性倔强，坚持己见，好容易才劝转他，才和马林等相会，但仍然是貌合神离。过了不多久，马林离开上海，先后去武汉、长沙、广州考察，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间，回莫斯科去了。大概要向东方局报告中国革命的情况，才回去的。陈独秀也是官僚地主家庭出身，在当时虽相信马克思主义，而实际却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他完全带着恶霸作风，领袖欲极强。每逢同志们和他辩论的时候，他动辄辄拍桌子，砸茶碗，发作起来。记得当时派赴郑州

作铁路工人运动的李震瀛寄来一个详细报告。<sup>6</sup>他看了最初几行，就大发牛性，接连砸破了两个茶碗。我劝他把报告看完了再说，他才勉强看下去，看完之后才觉得适才的动作过火了，他就是这么样的人。他本人并不阅读马列主义著作，书架上有一部法文资本论，他从不曾翻看过（他会法文）。他在报纸上写普通的政论是动听的，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则不懂，也不研究。“响导”上署他的名字的文章，大都是同志们代写的。他有时忽发异想，说我们到四川去，关着门干社会革命去。因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特征，在这时已经暴露了出来。

在马林等国以前，国际来电，要中国派遣一批青年到苏联参加一九二二年一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东方弱小民族会议（这是与当时帝国主义召开的华盛顿会议相对抗的），因此党中央派了二、三十个 S · V · 团员去到莫斯科，任弼时、罗亦农等人是在这时前去的。瞿秋白同志在这时已到了俄国，他原是由北京晨报社直接派去的。日本、朝鲜也都派代表团去了。

从这时起直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止，党中央方面除了间接指导京汉、陇海工运外，几乎没有做什么工作。

一九二二年三月，第三国际拍来一份英文电报，主张中国应干国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 译为国民革命）。当时我们不懂国民革命是什么。同年夏季，张国焘和十多位青年团员从莫斯科回到了上海，带来了国际指示，也带回许多文件。国际的指示主张中国应当实行国民革命，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建立民主国家。于是党就在七月间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时气象有些新鲜，那些青年团员学会唱国际歌，行动也很敏捷，带来了一些新的作风。他们看到我们国内这些党员俨然是学者式样，他们就送我们一个绰号，



叫做“学究派”。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上海举行的，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不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而是由陈独秀、张国焘指定从莫斯科回国的是那省的人就作为那省的代表。其中除陈独秀、张国焘外，有邓中夏、蔡和森、向警予、李达等。毛主席没有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第二次大会是在李达家里召开的，后来分成几个小组流动开会，今天在这里开，明天在那里开。大会的情况比第一次稍有进步。张国焘根据他从苏联带回来的英文打字的宣传品，分析了国际的局势，同时大家又研究了国内的局势，提出本党对时局的主张，因此分成几个小组讨论各项问题。会上第一次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在此以前不知道什么是帝国主义），认为中国人民的敌人主要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农民的问题在会上也提到了一点。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了宣言，并仍然选举陈独秀担任书记。

从以上情形看出：

1. 初期的党正在幼年时期，所以有许多不纯的分子混了进来，其中有地主，如沈玄卢、陈独秀、张国焘；有资产阶级，如陈公博；有投机分子，如李汉俊、周佛海等；有向上爬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有受不起考验的小资产阶级。另一方面，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许多忠诚的同志们，却代表着党的新生力量，他们是最富于革命彻底性的工人阶级的前卫，终于战胜了腐朽的反动力量，使我党成长壮大，领导了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

2. 初期的党员们有一部分即使是忠实于马列主义，仍是教条主义者，只知道说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其目的是无产阶级专政，至于如何应用马列主义于中国革命的实践，